

百种语文

小丛书

曹先擢 主编

古代白话 说略

GUDÀI BAIHUA SHUOLÜE

江蓝生 著



语文出版社
<http://www.ywcbs.com>

百种语文小丛书

GUDAI BAIHUA SHUOLÜE
古代白话说略

江蓝生 著

YUWEN CHUBANSHE
语文出版社

目 录

一	什么是“白话”	(1)
	1. 口语和书面语	(1)
	2. 文言与白话	(5)
	3. 古代白话与近代汉语	(7)
二	古代白话文献一览	(9)
	1. 敦煌俗文学作品	(9)
	2. 禅宗语录	(15)
	3. 宋儒语录	(21)
	4. 诗、词、曲	(24)
	5. 史书、史料	(29)
	6. 直讲和直译	(34)
	7. 话本和长篇小说	(36)
	8. 会话书	(40)
三	学一点古代白话常识	(43)

一 什么是“白话”

“白话”这个词儿意思挺多，在“空口说白话”里，它指的是没法儿实现或毫无根据的话；在“首长说的都是咱们老百姓的大白话”中，是指朴实无华、通俗易懂的话；而在某些方言里，“白话”就是闲聊天。这本小书所说的“白话”不是上面的意思，是指汉语书面语的一种形式。下面就请您听我说说“白话”。

白话是跟文言相对的书面语，要知道文言与白话的区别，先得知道口语和书面语的分别。

1. 口语和书面语

语言是人类交际的工具，口头上使用的语言叫口语，也叫口头语，它以语音(声音符号)为传播工具；书面上使用的语言叫书面语，也叫笔语，它以文字(形象符号)为传播工具。书面语的产生和发展，从根本上说是以口语为基础和源泉的。

从汉语发展的历史来看，大概自古以来书面语就跟口语不完全一致。试想，在发明造纸术和纸张广泛使用之前，书面语是一笔一笔刻在龟甲兽骨、铜器、石器或竹简上的，刻起来很费事；有的写在丝帛之上，这成本又多么昂贵！因此，我们推想，最初的书面语要比古人实际运用的口语简约得多，粗略得

多,即所谓“书不尽言”。比如甲骨上的文字就多是占卜吉凶的,有少数记事文字也大都跟占卜有关。不过话又说回来,从本质上看,最初的书面语跟口语之间的差别是比较小的,书面语大体上反映了当时口语的实际面貌。《诗经》里的《国风》是民歌的记录,《论语》是孔子的门人弟子对老师言谈话语的记录,应该跟当时的口语大体一致。比如《论语·学而》:“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很可能就是当时口语的如实记录。这句话跟现代口语的差别主要是单音词与复合词的差别。古代尤其是上古单音节词较多,“朋友”只用一个“朋”字、“快乐”只用一个“乐”字就行了。反问句式“不亦……乎?”跟今天的“不是……吗?”结构基本相同,只是所用词汇不同。晚清维新派人物王照就认为孔夫子的著作是用“当时俗言”写的,他说夏代殷代书中所没有的“也、已、焉、乎”等助词,实际上就相当于今天白话文中的“呀、么、哪、咧”等,这个看法是很有道理的。

语言是不断发展变化的,现代汉语跟古代汉语在语音、语法、词汇等方面都有许多不同。按说,当口语里的语音、语法、词汇发生变化时,书面语也应该相应地变化,但是汉语的事实却不完全如此,书面语远远滞后于口语的发展,其原因主要有三:

(1) 汉字的性质是形意文字,不以表音为原则,所以实际语音变了,汉字却可以不变,一个字在不同

的时代或不同的地域可以代表不同的声音。比如“白”字在古代是入声字,而在现代普通话里是阳平字;“白”普通话读[pai](阳平),贵阳话读[pe](阳平),苏州话读[baʔ](阳入),广州话读[pak](阳入),厦门话读[peʔ](阳入),读音各不相同,却仍用“白”字表示。汉字的这个特点缩小了古今书面语的距离,也使不同方言区的人们借助于汉字可以畅通无阻地进行交流。

(2) 书面语跟口语相比,比较保守。口语里早已消亡了的前代词汇和语法成分,往往仍在书面语中保存和复活。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在现代语体文中仍然使用一些文言虚词或格式。写到这里,我随手翻开桌旁一张《北京晚报》,在一篇不足 500 字的短文里就出现了“现已寸步难行”“对其进行护理”“将此情况报告”等二十几处使用了文言虚词的句子。由此可知,尽管是语体文,也跟实际口语有一定的距离。

(3) 由于社会历史的原因,以先秦口语为基础加工而成的一些古代文献,被历代尊崇为经典,后世文人学士刻意模仿沿袭,逐渐形成了一种固定不变的书面语——文言文。这种文言文随着时代的推移,跟口语的距离越来越大,以至发展到完全脱节的地步。中国历史上长期以文言文为正宗,文言文被认为是“雅”的,所谓“言之不文,行之不远”,因而文

言在书面语中占据着统治地位；白话文被认为是“俗”的，不登大雅之堂，只有小说、戏曲等才通篇采用白话。直到七八十年前，中国人的语言生活里，嘴上说的是方言，笔下写的是文言，两不相干。

如果说国人对于这一现象大多见怪不怪，外国人可就很难理解了。十六世纪末到我国传教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1552—1610）晚年在札记中写道：“在风格和结构上，他们的书面语与日常生活中所用的语言差别很大，没有一本书是用口语写成的。一个作家用接近口语的体裁写书，将被认为是把他自己和他的书置于普通老百姓的水平。”他还描绘了如下的情况：“几个人在一起谈话，即使说得很清楚、很简洁，彼此也不能全部准确地理解对方的意思。有时候不得不把所说的话重复一次或几次，或甚至得把它写出来才行。如果手边没有纸笔，他们就沾水把符号写在什么东西上，或者用手指在空中划，或甚至写在对方的手上。这样的情况更经常地发生在有文化的上流阶级谈话的时候，因为他们说的话更纯正、更文绉绉，并且更接近于文言。”从这段描述可以知道，在知识分子圈内，文言是社交用语，口语中的文言成分也很重，这是一种很不健康的风气。这种言文分家的畸形现象直到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才受到根本的冲击。“五四”新文化运动响亮地提出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的口号。从那时起，以现

代口语为基础的白话文(即语体文)才开始取代文言文,成为中国人普遍使用的书面语。

2. 文言与白话

如前所说,汉语的书面语可以分为文言和白话两大系统。什么是文言?什么是白话?简单点儿说,那些句中带有“之、乎、者、也、矣、焉、哉”的书面语是文言,而那些跟人们口头上讲的话大体一致的书面语是白话。文言最初也是建立在口语基础上的,但是后来日益脱离口语,变成一种僵化的、基本上保存先秦语法和词汇特点的书面语。当然,各个时代的口语也会对文言产生一定的影响,不必说明清时代的文言文跟先秦时代会有一些不同,就是位居唐宋古文派散文大家之首的韩愈的文章,在语法上也有跟先秦不尽一致的地方。比如他的《祭十二郎文》:“汝其知也邪?其不知也邪?”用了两个关系词“其”,而在上古只能用一个。又比如他的《答刘正夫书》:“有文字来,谁不为文。”先秦只用“以来”或“而来”,不单用“来”,单用“来”是六朝前后的事。不过总的来说,这种区别不很大,文言从古到今都有比较固定的格局。

白话是跟文言相对的书面语,它跟一定时代的口语相接近。白话的产生也有悠久的历史,比较保守地说,它是以东汉末年佛教的传入和汉译佛经的

大量出现为契机而发展起来的。为了宣传佛教教义,使目不识丁的平民百姓都能听得懂,一些僧人在翻译佛经时不得不放弃使用典雅的古文,而采用一种跟当时口语十分接近的文白夹杂的文体;另一方面,魏晋时期文人的笔记小说记录了当时民间的鬼怪传闻,其中的记言部分(即对话)较多地反映了当时的口语,晋人的尺牍(书信)是用语体写的。这样几股溪流就汇成了古代白话的源头。到了唐五代时期,出现了不少用当时口语做基础、搀杂了一些文言成分的半文半白的俗文学作品,如僧人的白话诗、民间曲子词、敦煌变文等,另外还有数量可观的禅宗语录,比较完整地记下了禅师们的话语。正是上述作品、资料奠定了早期白话的规模 and 基础,使我们得以从中窥见当时口语的大致面貌。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僵化的文言文占据着书面语的统治地位,这种现实成为普及教育和社会发展的障碍。从十九世纪末以来,一些有识之士相继发起了改革书面语的运动,有清末白话文运动,“五四”白话文运动和三十年代的大众语运动。这些运动一浪接一浪,对现代语体文的确立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今天,用语体文写作已成为理所当然的事,可是不要忘记,为了争得语体文的合法地位,在历史上曾经历过一段相当激烈的斗争呢!

3. 古代白话与近代汉语

古代白话跟汉语史的分期有直接关系。长期以来大学里教汉语只有古代汉语与现代汉语之分,把“五四”时期以前的语言统统称为古代汉语。这种分期忽略了文言与白话的区别,没有正确地反映汉语发展的历史阶段,因而是不太科学的。早在本世纪二十年代末,著名语言文字学家黎锦熙先生就提出了“近代语”的概念,他说:

近来继承清代朴学家,更应用科学的方法,而从事于中国之“语言文字学”(philology)者,其取材仍偏重上古(先秦)与中古(隋唐),或参以现今之国语与方言,未免抹煞近代(宋元至清约九百年间一大段)。此大段实为从古语到现代语之过渡时期,且为现今标准国语之基础。(《中国近代语研究提议》1928.10《新晨报副刊》)

这里所谓“近代语”,就是此后吕叔湘先生所说的“近代汉语”。黎先生把近代汉语的上限定为宋,吕先生则前移至晚唐五代,理由是:“尽管从汉魏到隋唐都有夹杂一些口语成分的文字,但是用当时口语做基础,而或多或少地搀杂些文言成分的作品是直到晚唐五代才开始出现的(如禅宗语录和敦煌俗文学作品),因此我们建议把近代汉语的开始定在晚唐五代

即第九世纪。”(见为刘坚《近代汉语读本》所作的序)不管把近代汉语的上限定在宋,还是定在晚唐五代,都是以白话文献的出现为依据的,也就是说近代汉语是以古代白话文献为研究资料,主要以隋唐以后的口语为研究对象的。现在国内学者大都接受把近代汉语的上限定在晚唐五代,把下限定在明末清初。当然,也有人倾向于黎先生的观点。

把汉语史由古代和现代的二分法改成古代、近代、现代的三分法不仅符合汉语发展的历史事实,而且也便于研究者分段开展研究。不过,如果以“文言”和“白话”来划分,那么古代汉语属于文言的系统,而近代汉语和现代汉语都属于白话的系统。

二 古代白话文献一览

古代白话文献数量大,内容十分丰富,当然这些资料中所包含的白话成分有多少之别,纯杂之异。拿吕叔湘《汉语语法论文集》和日本汉学家太田辰夫《中国语历史文法》书后所附的引书目录来看,不下几百种,其中有的作品是文白夹杂、半文半白的,有的通篇纯用白话,因此这些作品阅读时的难易度不同,研究上的价值也不等。八十年代初,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的刘坚先生曾着力于古代白话文献的介绍和整理工作,写有《古代白话文献简述》一文(载《语文研究》1982年第一辑),编著了供高等学校中文系开设近代汉语课程用的《近代汉语读本》(上海教育出版社1985;修订本1995)。此外,刘坚、蒋绍愚主编的《近代汉语语法资料汇编》三册(北京商务印书馆)也选收了一批最重要的古代白话文献选段。下面我们参考上述论著,按类扼要介绍一些最有代表性的白话文献及其语言特点。

1. 敦煌俗文学作品

敦煌文书出自甘肃省敦煌莫高窟藏经洞。据专家考证,藏经洞大约封闭于十一世纪初瓜沙州曹氏地方割据政权覆亡前夕。为了躲避西夏进扰,洞窟

僧人在出逃前把大批寺院经卷、文书隐藏在一个洞窟甬道的复壁内(今编号为 16 洞窟)。后来洞窟的僧人没有回来,这批文书就一直沉睡了九百年,直到 1900 年(一说 1899 年)被一个姓王的道士无意中发现。藏经洞内藏各种经卷、文书约二万二千余卷,大部分是写本,只有百分之一、二为刊本。这就是举世闻名的敦煌石室藏书。从 1901—1907 年间,英国人斯坦因(M. A. Stein)和法国人伯希和(P. Pelliot)劫走了其中的大部分精品。直到 1910 年清政府才派人把劫余部分运到北京,押运途中以及到京后又遭劫夺。劫余部分收藏在北京图书馆,约有八千余卷,斯坦因所获九千卷收藏在伦敦大英博物馆,编号以字母 S 打头;伯希和所获五千卷今藏巴黎国家图书馆,编号以字母 P 打头。此外还有一些散落在日本和俄罗斯。台湾黄永武主编的《敦煌宝藏》把藏于伦敦、巴黎和北京图书馆的卷子全部影印成书(共 140 册),使用十分方便。

在敦煌文书中,最能反映唐五代白话面貌的是一些俗文学作品,如变文、俗赋、曲子词、王梵志诗等,其中又以变文的价值最高。所谓变文,是指唐代寺院里盛行的一种又说又唱的文学形式。讲唱的题材十分广泛,有宣讲佛经教义的讲经文,如敦煌文书中的《维摩诘经讲经文》、《父母恩重经讲经文》、《无常经讲经文》等,一般先引一段经文,然后用散文加

以解释,用韵文咏唱铺排;还有演绎佛经中神变故事的佛陀变文,如《降魔变文》、《破魔变文》、《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丑女缘起》等。这类变文内容充满了浪漫色彩,情节曲折奇巧,语言形象生动,很有文学吸引力。还有一类变文内容取自民间传说或历史人物,如《孟姜女变文》、《李陵变文》、《王昭君变文》、《伍子胥变文》等,除了少数两篇如《秋胡变文》、《舜子变文》之外,也大都是有说有唱,散韵相间的。

敦煌俗文学中有一类篇名题为“话”或“话本”,如《庐山远公话》《韩擒虎话本》等。话本小说大都通篇用散文叙述故事,大概是说书人的底本。

唐代僧侣的俗讲活动深受平民百姓的欢迎。韩愈《华山女》诗形容当时的盛况是“街东街西讲佛经,撞钟吹螺闹宫庭。”赵璘《因话录》说当时一位有名的俗讲大师文淑“其声宛畅,感动里人”,“愚夫冶妇乐闻其说,听者填咽寺舍”。这类讲唱活动不限于寺院道观,民间也十分流行。唐末吉师老《看蜀女转昭君变》诗说:“翠眉颦处楚边月,画卷开时塞外云。”可见讲唱者应有底本,并有图画展开,与讲唱相辅,使听众在视听两方面都得到满足。

讲唱文学的对象是平民百姓,为了使他们听而能懂,变文、话本的语言力求通俗,贴近生活。比如《破魔变文》写三个魔女企图用美色引诱世尊(佛祖),被世尊变为丑女(括号内是笔者的简释):

於是世尊垂金色臂，指魔女身，三个一时化作老母。且眼如珠盞，面似火曹（即糟，烧焦的木头），额阔舌尖，胸高鼻曲，发黄齿黑，眉白口青，面皱如皮裹髑髅，项长一似箸头飣子（筷子头上的圆形面食）。浑身锦绣，变成两幅布裙；头上梳钗，变作一团乱蛇。身卷项缩，恰似害冻老鸱（怕冷的猫头鹰），腰曲脚长，一似过秋谷鹪（鸟名）。

《庐山远公话》中有一段写远公被强盗白庄虏去为奴，一夜远公念《涅槃经》，被白庄知觉，二人有大段对话，是当时口语的真实反映，略摘数语于下：

白庄于东岭上惊觉，遂乃问左右曰：“西边是甚声音？”左右曰：“启将军，西边是虏来者（的）贱奴念经声。”白庄闻语，大怒非常，遂唤远公直至面前，高声责曰：“你若在寺舍伽蓝，要念即不可；今况是（却是）随逐于我，争合（怎该）念经！”远公曰：“将军当日虏贱奴来时，许交（教）念经。”白庄曰：“我早晚（何时）许你念经？”远公当即不语，被左右道：“将军实是许他念经。”……

敦煌俗文学作品中有一类故事赋的口语程度也很高，如《燕子赋》、《韩朋赋》、《茶酒论》、《𪚩𪚩书》等。《𪚩𪚩书》描绘出一个性格泼辣，敢闹敢斗的妇女形象：

斗唇合舌，务在喧争。欺儿踏婿，骂詈高声。翁婆共语，殊总不听。入厨恶发（发脾气），翻粥扑羹，轰盆打甑，𦏧釜打铛（𦏧：摔打）……阿婆嗔着，终不合𦏧（顶吵），将头自磕，筑天筑地（筑：碰击），摸著卧床，佯病不起。见婿入来，满眼流泪。夫问来由，有何事意？没可分疏，口称：“是翁婆骂我，作奴婢之相，只是耽眠夜睡，莫与饭喫，饿急自起。”阿婆向儿言说：“索（娶）得个屈期（奇）丑物入来，与我作底（抵）。”新妇闻之，从床忽起：“当初缘甚不嫌，便即下财下礼？色（索，即娶）我将来，道我是底（抵：对头）！未许之时，求神拜鬼，及至入来，说我如此！”新妇乃索离书：“废我别嫁可憎夫婿（另嫁如意郎君）！”

一个泼辣妇女的形象跃然纸上，简直呼之欲出。后来宋元话本《快嘴李翠莲》就受到此赋的影响。

敦煌文书中还有一类民间曲子词，是文人词作的先河。由于这类曲子词不少是乐工伶人创作的，又由歌伎传唱，因而内容有许多是反映爱情或妇女的不幸遭遇的，语言通俗如话。

莫扳（折）我，扳我太心偏。我是曲江池边柳，者（这）人折去那人扳，恩爱一时间。（《望江南》）

有一首《菩萨蛮》，一连用了六个咒誓，写出了对于爱情的忠贞不渝：

枕前发尽千般愿：要休（翻悔）直待青山烂；水面上秤锤浮，直待黄河彻底枯；白日参辰现，北斗回南面；休即未能休，且待三更见日头。

除了以上题材，还有写战争和普通百姓如商人、书生、渔父各种人物的生活的，虽然艺术上比较粗糙，但作为古代白话的资料还是很有价值的。这类作品收录在任二北编录的《敦煌歌辞总编》和饶宗颐、戴密微（P. Demiéville）编辑的《敦煌曲》中。

跟口语最为接近的韵文是敦煌本王梵志的五言白话诗（极少数为六言），如大家所熟悉的“城外土馒头（喻坟头），馅草在城里。一人吃一个，莫嫌没滋味。”据项楚《王梵志诗校注》考证，“王梵志诗”并非一人一时所作，而是若干无名白话诗人作品的总称，应是从初盛唐至晚唐五代乃至宋初的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由僧侣和民间文人陆续创作的。现举产生于初唐，内容有浓重世俗气息的一首为例：

世间慵懒人，五分向有二。例着一草衫，两膊成山字（形容瘦骨伶仃）。出语觜头高，诈作达官子。草舍元无床，无毡复无被。他家人定（十二时之一，指夜深）卧，日西展脚睡。诸人五更走，日高未肯起。朝